

## 《易传》对《周易》信息结构的贡献

李国正、王箭飞\*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 摘要

《周易》的信息内容由“经”和“传”两部分构成,信息结构包括自然生态、社会文化、思维观念三个层次。《易传》对《易经》的补充和阐发是其系统化科学化不可忽缺的重要因素,《易传》对《周易》信息系统的构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关键词:** 周易, 易传, 易经, 信息结构

---

\* 李国正,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王箭飞,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 The Contribution of “Yizhuan” to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Zhouyi”

LI Guozheng, WANG Jianfei  
*L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Zhouyi consists of two parts: Jing and Zhuan.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concept. The supplement and elucidation of Yijing in Yizhua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its 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Yizhuan made a cre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Zhouyi information system.

**Keywords:** Zhouy, Yizhuan, Yijing, information structure

## 一、前言

《左传》是中国传世文献中最早运用《周易》来论事、测事、传播信息的儒家经典。《左传》用《周易》论事有 6 例, 占筮测事有 14 次, 其中有 3 次用本卦, 11 次用之卦(即变卦)。运用之卦的次数占绝对优势, 表明《周易》在春秋时期对变化纷繁的社会人事已具有相当强的解释能力, 而《左传》的解释都可以在《易传》中找到依据。可见,《易传》为增强《周易》的解释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易传》对《周易》卦象和义理的阐发, 先贤时俊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但《易传》对《周易》构成多层次信息系统的作用, 却没有引起易学研究者的重视, 本文探讨《易传》对《周易》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思维观念层次构建所起的科学性系统性作用, 证明《易传》对《周易》信息系统的构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 二、自然生态层次

《易经》是《周易》的主干, 其信息结构的基础是自然生态。这在卦辞和爻辞中表现为五个方面的信息:

1. 气象: 霜、冰、云、雨、震、陨;
2. 色彩: 玄、黄、白、朱、赤;
3. 植物: 茅、苞桑、莽、杨、丛棘、杞、包(匏)瓜、硕果、菟、木、株木、林、蒺藜、葛藟;
4. 动物: 马、牝马、白马、良马、马匹、鹿、禽、小畜、大畜、虎、鱼、鲋、牛、牝牛、童牛、黄牛、龟、灵龟、羊、羝羊、豕、豮豕、豚、鼯鼠、狐、小狐、鸟、飞鸟、隼、雉、鸿、鸣鹤、大牲、豹;
5. 自然景观: 天、地、田、野、郊、渊、陆、沙、泥、石、坎、月、大川、荒、河、泉、干(岸)、陂、陵、高陵、西山、岐山、丘、丘园、幽谷。

这些信息都是一些独立的概念, 相互之间没有逻辑上、文化上或其他方面的联系。每一组概念虽然在语言词义上可归为一类, 但并没有构成相互联系的科学系统, 因而解释性不强。《易传》对《易经》科学性系统性的建设, 在自然生态层次上的表现, 一是补充了必要的信息, 二是构成了相互联系的信息系统。

对气象补充了两点重要内容。《乾·文言》说:“云从龙, 风从虎。”《屯·彖传》说:“雷雨之动满盈。”卦辞和爻辞都未提到的“风”和“雷”,《文言》和

《象传》给补出来了。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八个经卦与自然、社会、人事产生广泛联系，绝不能缺少“风”和“雷”。

对色彩补充了“黑”。《说卦传》“其（笔者按：指“坤”）于地也，为黑”，这就构成了中国先秦时期的正色体系：玄（青）、赤、黄、白、黑。“玄”，《辞源》解释为“天青色”，《坤·文言》“天玄地黄”孔颖达疏：“天色玄地色黄”。可见“玄”就是“青”色。

《易传》补充的具体植物名称，即《说卦传》提到的“木果、苍筤竹、萑苇、果蓏”。《离·彖传》说“百谷草木丽乎土”，在植物的总名上补充了“百谷、草”。

补充的动物总名有“兽”（见《系辞下》）、“黔喙之属（山居之兽）”（见《说卦传》）。具体的动物名称有《系辞下》提到的“蛇、尺蠖”，以及《说卦传》提到的“鸡、狗、鳖、蟹、蠃、蚌、鼠”。

自然景观方面补充的信息有《蒙·彖传》“山下出泉”之“山”，《讼·象传》“天与水违行”之“水”，《履·象传》“上天下泽”之“泽”，《同人·象传》“天与火”之“火”，《离·彖传》“日月丽乎天”之“日”及“百谷草木丽乎土”之“土”，还有《说卦传》提到的“径路”和“沟渎”。其中，“山、水、火、泽”是自然生态层次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这四种元素与《易经》卦爻辞已有的“天、地”以及《乾·文言》和《屯·彖传》补充的“风、雷”一起，构成了《易经》八卦最基本的自然生态结构。《说卦传》阐发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清】阮元校刻，1980，页94）

这样，彼此不相干的八种基本元素之间就有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相反相成、相互消长，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符合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因而不仅能够解释日月星辰、自然气候、植物动物的运动变化，而且可以用来解释死生祸福、社会兴衰和人事更替。根据《左传》和《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八卦象征的自然物象与人和社会物象已经产生了对应关系：

乾：天、王、君、父；

坤：地、马、帛、母；

震：雷、车、足、男；

巽：风、女；

坎：水、川、夫、众；

离：火、日、鸟、牛、公侯；

艮：山、庭、男；

兑：泽、旗；（郑万耕，1997，页 38-39）

这样一个关系网，纵向八种自然元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横向每一种自然、社会人事元素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信息纵横互通的解释系统。《左传》和《国语》把自然物象与社会人事相联系，就为《周易》构建一个自然与人信息互通的自然生态系统奠定了基础。《说卦传》增添了更为丰富的人物、自然物象以及人造物象，在《左传》和《国语》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乾：天、首、君、父、环、玉、金、寒、冰、大赤、良马、老马、瘠马、驳马、木果；

坤：地、母、布、釜、吝嗷、均、子母牛、大舆、文、众、柄、黑；

震：雷、龙、玄黄、寡、大涂、长子、决躁、苍筤竹、萑苇、善鸣马、鼻足马、作足马、的颡马、反生稼、健稼、蕃鲜稼；

巽：木、风、长女、绳直、工、白、长、高、进退、不果、臭、寡发人、广颡人、多白眼人、近利、市三倍、躁；

坎：水、沟渎、隐伏、矫輮、弓、轮、中男、加忧人、心病人、耳痛人、血、赤、美脊马、巫心、下首、薄蹄、曳、多眚舆、通、月、盗、竖多心木；

离：火、日、电、中女、甲冑、戈兵、大腹人、鳖、蟹、蠃、蚌、龟、科上槁木；

艮：山、径路、小石、门闕、果蓏、闾寺、指、少男、狗、鼠、黔喙之属、竖多节木；

兑：泽、少女、巫、口舌、毁折、附决、刚卤、妾、羊。

《说卦传》把当时实际运用的八卦对应的物象加以调整和扩大，除了增加物象的品种外，还在同一种物象中细分若干类别，而且增加了人为景观及表示性质和行为特征的信息，显然《易传》构建的自然生态系统比《左传》和《国语》运用的解释框架更细致，解释力更强。人事与自然的对应融合，表明《周易》把人视为自然的构成元素，体现了《易传》对人与自然的整体观，这是汉代“天人合一”理论提出的思想基础。经过《易传》创造性的阐发，《周易》自然生态层次所

蕴含的不再是零散的纯粹的自然信息，而是一个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合乎自然规律，具有很强科学性的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包含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 气象季节及特征。如“日、月、雷、电、旉（孔颖达疏：取其春时气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高（孔疏：风性高远）”。
2. 自然地理及特征。如“山、泽、沟渎、吝嗇（孔疏：取其地生物不转移）、刚卤（孔疏：取水泽所停则碱卤）”。
3. 植物及其特征。如“萑苇、反生稼、坚多节木、绳直（孔疏：如绳之直木）、附决（孔疏：果蓏之属则附决）”。
4. 动物及特征。如“狗、子母牛、良马、的颡马（孔疏：白额为的颡）”。
5. 人为景观及物品。如“门闕、閤寺、布、金、玉、大輿”。
6. 人之称谓及特征。如“父、母、长女、中女、少女、寡发人、多白眼人、口舌（孔疏：取口舌为言语之具也）”。

这六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为利用自然信息解释社会人事提供了广大的空间。

### 三、社会文化层次

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是社会文化层次，因为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自然生态系统如果毁灭，人类社会就会崩溃，社会文化也就不复存在。社会文化层次首先包含了数学信息。从卦辞、爻辞里提到的数字和记录爻的排列顺序的数字看，《易经》展现了一个以“百”为最大单位的基数词系统。这些数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虽然《震·六二》爻辞有“亿丧贝”，但据王弼、韩康伯注：“亿，辞也”（【清】阮元校刻，1980，页62），可知“亿”是语气词，并非数词。《易经》的这套基数词比较原始质朴，还看不出明显的数学思想。《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下》又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这就为《易经》在基数词之上形成具有数学思想的科学系统奠定了基础。文王六十四卦按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的序列递进，即为2之累乘方：2、2、2、2、2、2，这就是数学的二进法。《周易》卦象的演进，

遵循数学之二进法, 单卦由两画或一横之阴阳两爻符号, 每三爻合成一组, 共有  $2=8$  组, 即八卦。重卦则六爻合成一组, 以 2 为底数, 6 为指数,  $2=64$  组, 即六十四卦。照此增加至 2 则为无穷数。此乃排列组合法之先导。《周易》所用之中国式模数法 (Modulus) 较近代模数法早 3000 年 (沈宜甲, 1984, 页 166-167)。可见《易传》对《周易》数学思想的科学化起着关键性建设作用。

社会文化层次还包含了人的称谓信息。《易经》中的卦爻辞显示了如下的身份关系:

1. 家庭称谓: 祖、考、妣、父、母、长子、子、女、妹、娣、夫、老夫、妻、女妻、老妇、士夫、家人;
2. 社会称谓: 女子、小子、童、主、客、宾、友、朋、邻、邑人、幽人、行人、旅人、武人;
3. 道德称谓: 丈夫、夫子、大人、君子、丈人、弟子、小人、恶人;
4. 阶级称谓: 王、帝、天子、国君、大君、王母、君、公、侯、官、士、主人、史巫、宫人、童仆、臣、妾、寇。

《易传》把上述人的称谓信息加以调整组织, 使之与自然生态层次接轨, 并在此基础上条理化、系统化,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伦理原则。《序卦传》说: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有上下, 然后礼义有所错。”

【清】阮元校刻, 1980, 页 96) 这样看来, “礼义” 基于 “上下” 地位的差别; 地位基于 “君臣” 主从关系的搭配; 主从基于 “父子” 血缘的先后; 血缘基于 “夫妇” 姻缘的约定; 姻缘基于 “男女” 性别的差异; 而性别是 “万物” 分化的结果; “万物” 则是 “天地” 的产物。按这个说法,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生成的, 所以上下尊卑是人人必须承认的事实。伦理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 以及用来规范和维系这些关系的准则——礼义。

既然人是天地的产物, 因而天、地、人贯穿着普遍的法则, 这就是《说卦传》所说的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 是与 “阴阳”、“柔刚” 相通的法则, 那么 “仁” 与 “义” 又指的是什么呢? 《系辞下》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 圣人之大宝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辞, 禁民为非曰义。”【清】阮元校刻, 1980, 页 86) 因此, “仁” 的内涵是遵从天地造化的法则, 谨守其位。“义” 的内涵是禁止乱位的行为。“位” 的内涵就是尊卑贵贱的等级次序。《系辞上》说: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 与天地乾坤对应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就是尊卑在人伦中

的具体体现。在这些两两相对的关系中，前者总是处于主动地位，后者总是处于顺从地位，如果不遵循这一规则，就是乱位。

但是，处于主动地位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尊者必须使自己的行为遵从天地自然的法则，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尊者才能保守其位，得到卑者的尊重。

《文言传》提出的天之四德，也就是尊者应当具备的美德，尊者有了“体仁”、“嘉会”、“利物”、“贞固”这四种美德，就能合于天地自然的法则，就能得到卑者的顺从和尊重，也就能保住尊者的地位。否则，不但不能得到卑者的尊重，甚至地位和生命也保不住，因为这是与天地自然法则背道而驰的。卑者的品德在于含美于内，顺行于外，即《坤·彖传》所说的“顺承天”、“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就像大地一样容载万物，这就是地道、坤道、女道、妻道、子道、臣道。但是卑者并非一味盲从，《乾·文言》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在上位的人不具备尊者的美德，在下位的卑者就不会辅佐他。这样，《易传》把自然万物产生的时间先后序列，转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上下主从关系，并且把卦象与人的阴阳属性和地位尊卑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套与自然信息相通的伦理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易传》构建的伦理系统使《周易》解释人事的功能明显增强。

社会文化层次包含的艺术信息，主要集中于《易传》，但与《易经》的联系也是明显的。中国古代比较原始的艺术信息，体现于《易经》一些爻辞对自然色彩的评价。例如：

1.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大过·初六》“籍用白茅，无咎”；《贲·上九》“白贲，无咎”。
2. 《坤·六五》“黄裳，元吉”；《离·六二》“黄离，元吉”；《解·九二》“得黄矢，贞吉”。

这两组爻辞透露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白、黄两种色彩的审美评价，但这种评价只是把人们对色彩的感受与人事吉凶休咎挂钩的程式化，还未确立基本的审美原则，当然也就谈不上系统化。

《易传》把早期的美的感受提升到理论高度，构成了一个以自然美为最高审美原则，以对称美和中正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信息网。就美的性质而言，《易传》提出了一个以自然美为母，以阳刚美和阴柔美为子的理论体系。自然美是由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引发的美感，《周易》的发端，就是出于观察自然物象的领悟，所以《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

万物之情。”(【清】阮元校刻, 1980, 页 19) 由于天地万物是美产生的客观根源, 所以《系辞上》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而拟诸其形容, 象其物宜。”至于《系辞下》所谓“天地絪縕, 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 万物化生”, 以及《系辞上》“法象莫大乎天地, 变通莫大乎四时,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都是赞美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美。这体现了没有人为痕迹的朴素的自然形象是真美的审美基本原则。这一审美原则是在《易经》爻辞对白色评价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 它对后来的中国美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说: “衣锦褻衣, 恶文太章; 贲象穷白, 贵乎反本。”(刘勰, 1937) 显然, 自然美作为审美原则在后来的美学理论中占有很高地位, 这不能说与《易传》的美学思想毫无关系。

如果说自然美是天地万物融合构成的和谐美, 那么阳刚美就只是体现了自然美的一个方面, 这种美是由自然界中具有阳性特征的事物所引发的美感, 它与由自然界中具有阴性特征的事物引发的美感相对称, 又相补充。就《易经》的卦爻辞看, 虽然乾卦的爻辞提到“龙”、“大人”, 坤卦与“牝马”、“冰”、“霜”相联系, 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审美倾向, 因此, 有关阳刚与阴柔的美学理论, 可以说是《易传》的创造性发展。《说卦传》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 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 曰柔与刚。”《系辞下》说: “乾, 阳物也。坤, 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所以, 《乾·文言》说: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 刚健中正, 纯粹精也。”这种阳刚之美与人的品德相比附, 就有《大畜·彖传》所说的“刚健笃实辉光, 日新其德”, 而德行光辉的人有如日月经天, 因此, 《乾·象传》说: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 阳刚之美不仅发源于自然, 而且体现于君子, 自然与人于是具有同一种美。这种蕴含着力量和意志的阳刚美对中国的音乐、舞蹈、书法、建筑、雕刻、绘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柔美体现了自然美的另一个方面。相对于阳刚美表现的力量和意志而言, 阴柔美表现的是婉约和含蓄。《坤·彖传》说: “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坤厚载物, 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柔顺利贞, 君子攸行。”《坤·文言》说: “坤至柔而动也刚, 至静而德方, 后得主而有常, 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 承天而时行。”又说: “阴虽有美, 含之以从王事, 弗敢成也, 地道也, 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大地是万物滋生的基础, 以其宽厚博大而承载万物, 这是阴柔美产生的根源。所谓“乃顺承天”、“柔顺利贞”、“承天而时行”、“含之以从王事”, 是把阴柔美作为阳刚美的补充放在从属地位, 因而阴柔美在中国艺术领域中不占有统治地位。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解释代表了乾尊坤卑的这一传统看法, 他说: “地道也, 妻道也, 臣道也者, 欲明坤道处卑, 待唱乃和, 故历言此三事皆卑, 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者, 其地道卑柔, 无敢先唱, 成物必待阳始先唱, 而后代阳有终也。”(【清】阮元校刻, 1980, 页 57-58) 可见

阴柔美不能取得与阳刚美同等的地位，并非审美原则厚此薄彼，而是审美观念差异所致。

就美的形式而言，经卦的乾卦象以中线为参照上下对称，坤卦象还以中空为参照左右对称。单卦重叠为复卦后，仍然形成对称格局，全部六十四卦卦象都具有互补均衡的对称形式。但卦象对称的形式美《易传》没有加以阐发，却以《易经》的一句爻辞为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中正美的理论。《夬·九五》：“中行，无咎。”王弼、韩康伯注：“处中而行，足以免咎。”于是《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以及《离·彖传》“柔丽乎中正”就不但认为阳刚的事物具有中正特征，而且指出阴柔依附于阳刚，因而阴柔的事物也就具有了中正特征。《豫·象传》说“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不终日”因为具有中正特征，所以就吉利。孔颖达这样解释《姤·象传》“九五含章，中正也”这句话：“中正故有美，无应故含章而不发，若非九五中正则无美可含，故举爻位而言中正也。”（【清】阮元校刻，1980，页77-81）由外在的形式美推及人的内美，并且把《易经》爻辞对黄色的审美评价结合起来，所以《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又由人的内美扩展到人际关系，《家人·彖传》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样，中正美就成为联系自然与社会来衡量形式美和人的道德品格的一体二用的标准。

《易传》构建的伦理系统虽然使《周易》客观上成为儒家文化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但在学术上仍然具有推动《周易》零散人事信息系统科学化积极因素。而《易传》构建的二进制中国式模数法，则是举世公认的科学数学思想的创举，使《周易》信息系统的科学性更加严密。至于《易传》把中国人早期的审美感受升华为审美原则，并由此构建了一个以自然美为最高审美原则的评价系统，是对《周易》信息系统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 四、思惟观念层次

思惟观念层次的信息在思惟特征上首先由卦爻象与数目的关系表现出来，是谓象数思惟。这种思惟把象与数结合起来考察事物的变化过程和规律。《易传》的功劳是扩展了“象”与“数”的内涵，即“象”不仅指卦象与爻象，而且联系到卦爻象象征的事物的形象；“数”不仅指代表阳爻阴爻的“九”与“六”，从“初”至“上”的爻位数目，而且指阳爻阴爻的数目变化和数量对比。因此，运用象数思惟，既可通过形象感知事物的性质信息，又可通过数目消长，考察事物由量变引起的信息变化。

其次,《易经》每卦配以卦辞,每爻配以爻辞的格局体现了以象达意、以意释象的信息模式。把象与意结合起来认识事物,是谓意象思惟。“意”不仅包括卦象、爻象本身具有的意义,而且包括卦辞、爻辞所蕴含的义理。《易传》的贡献是把“意”、“象”与社会文化信息联系起来综合分析,从而开拓了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新领域。

再次,《易经》的《泰》卦辞“小往大来,吉,亨”、《否》卦辞“大往小来”、《泰·九二》“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透露了朴素的辩证思惟信息。《易传》进一步把自然和人事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矛盾双方如阴阳、顺健、柔刚、小人君子、道之消长,以至万事万物,都是一体两面、矛盾统一,彼此相对消长的。所以,《泰·彖传》说:“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彖传》也说:“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易经》的六十四卦把象、数、自然和人事信息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种整体观念。《易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观念理论,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这表现了一种天地人和谐相通,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世界观。《系辞上》认为世界是从混沌之物的分化开始的,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此生生不息,以至于无穷。世界有两个层次:一是可感知的实体,即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再是不能直接感知的性质或规则,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有形之器是世界存在的形式,无形之道是世界存在的实质。这个法则的核心就是“变”。《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这就是说,变化的动因在事物内部。

《系辞上》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是天地所生,所以圣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可见,人应当在不违背天地自然运动规律的范围内努力有所作为,使万物各得其宜。这就是《易传》的人生观。《说卦传》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义以至命”,主张用道德义来规范人生。《易传》的人生观对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有很深的影响。

《易传》的价值观是与审美原则互为表里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至美至善的境界。要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就必须以“美”和“善”为最高价值取向。《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德与人德一体两面,

所以《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之道与人道也是一体两面，同为一物。《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谓“继之”、“成之”就是以善行和仁义之性去追求“道”，去实现“道”。这个“道”就是天地、阴阳、刚柔的完美结合，也就是天人合一、至美至善的理想境界。君子以“体仁”、“嘉会”、“利物”、“贞固”四德律己，力求达到至美至善的理想境界，这也是君子应有的价值观。《易传》主张靠人的情感体验去完善人格，导致中国人把伦理道德看得比科学真理还重要。

《易传》的象数思惟、意象思惟，以及把象、数、自然和人事信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思惟，使《周易》信息系统的辩证思惟特征更加强化，科学性也进一步增强。

可见，《周易》之所以成为包含自然生态、社会文化、思惟观念多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信息结构，《易传》对《易经》的补充和阐发是其系统化科学化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易传》对《周易》信息系统的构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 参考文献

- 刘勰（1937）。《文心雕龙》。商务印书馆。  
阮元校刻（1980）。《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沈宜甲（1984）。《科学无玄的周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郑万耕（1997）。《易学源流》。沈阳出版社。